



把握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政策重点

□ 封北麟

自2016年8月国务院发布《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以下简称48号文)以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取得显著成效。但是,近一年来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成本反弹,资本市场活力下降,与降成本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出现市场流动性与信用、融资渠道的短期过度紧缩,导致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度凸显。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是打赢防风险攻坚战的基础,未来应进一步优化金融结构,推动小微金融服务体系多元化建设,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强企业发展活力。

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成本整体呈现持续上升态势

2017年以来,我国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成本一反2015年以来的持续下降态势,呈现出持续上升态势。其中银行信贷、债券等传统融资渠道的利息成本增长较快。同时,企业融资结构不合理问题更为严重,融资期限明显缩短、融资渠道大幅收窄、直接融资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明显增加。

实体经济企业融资的利息成本持续增加。从银行信贷渠道看,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从2016年12月的5.27%,上升至2018年3月的5.96%,上升了0.69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从2016年12月份的5.44%,上升至2018年3月的6.01%,上升了0.57个百分点;票据融资加权平均利率从2016年12月的3.9%,上升至2018年3月的5.58%,上升0.68个百分点。

从债券市场融资渠道看,企业债、公司债以及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的利率走势均呈现上涨趋势。从具有代表性的7年期企业债券利率走势看,债信评级AA、AA+、AAA+以上的投资级债券的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从2017年1月的4.78%、4.48%、4.18%,上升至2018年6月的平均5.81%、5.36%、5%。从3年期中期票据的利率走势看,债信评级AA、AA+、AAA+以上的票据加权平均

利率,分别从2017年1月的3.87%、4.1%、4.37%,上升至2018年6月的4.71%、5.06%、5.48%。

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期限有所缩短。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8年全国大型“降成本”调研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7年,各类实体企业银行短期借款占其全部银行借款比重从35.21%升至72.78%。另据中国人民银行2018年1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中长期贷款增量占比为77.0%,比上年同期低20.8个百分点。

实体企业银行信贷融资渠道的依赖度进一步提升。受规范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及清理“影子银行”影响,大部分银行理财、资管计划等表外“类信贷”融资渠道被截断,实体企业对银行信贷融资渠道的依赖度增加。实体企业融资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度明显上升,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化、结构不合理问题更为严重。

企业债券融资隐性成本上升。近年来,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刚性兑付逐渐被打破,债务违约增多。

企业融资成本上升的原因

货币与信用出现暂时性紧缩局面。随着对商业银行表内同业业务、表外理财与委托贷款业务及资管产品等各类影子银行业务的规范,我国货币派生渠道大幅收窄,货币供应量M2增速明显放缓,从2017年1月的10.7%下降至2018年3月的8%。各类金融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借贷、慎贷、抽贷”等信用紧缩局面,社会融资存量规模增速从2017年1月的12.74%下降至2018年6月的9.83%。当前,在“去杠杆”政策转向“稳杠杆”政策的导向下,人民银行必将通过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维持市场流动性稳定,但受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影响,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的速度和规模,特别是流入小微企业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速度和规模仍将十分有限。

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尚不满足市场发展需要。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金融领域普遍存在的“脱实向虚”问题与我国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及承担风险能力的不足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受经济体制、政府隐性担保和市场刚性兑付等制度性因素影响,我国

新时代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从这里出发,就知道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应该怎么做,在哪里在哪里、着力点在哪里、目标在哪里、责任在哪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

的鲜明导向,把敢不敢干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大力选拔任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发挥“鲶鱼效应”,激活整个干部队伍。

教育培训上促使干部善于担当。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要坚持集中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使干部切实掌握看家本领。坚持组织培训与个人自学相结合,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素养、专业精神,使干部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加快干部知识更新、能力培训、实践锻炼,使干部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壮筋骨,提高适应新时代、实现新目标、落实新部署的能力。

管理方式上推动干部敢于担当。运用科学理念、科学思维、科学办法进行管理,切实管到位、管到点子上,保护和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坚决反对和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着力解决“文山会海”有所反弹、“痕迹管理”泛化和检查督查考核频率过高、多头重复等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为干部减压、松绑,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加强统筹规范,控制各级开展监督检查、索要材料报表的总量和频次,让基层把更多时间用在抓落实上来。

工作氛围上激励干部乐于担当。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旗帜鲜明支持和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让真正干事的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形成干部一心一意想工作、组织一心一

金融体系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以及大型民营企业集团,为私营经济、中小微民营企业服务的小微金融服务体系远未形成,不能适应实体经济已经出现的结构化转变。金融机构在精细化经营管理、风险管控体系建设、契合实体经济发展方面的金融创新进展缓慢。金融监管举措对金融企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引导性不足,导致货币与信用经常出现不对称的大起大落现象,尤其在一些国民经济薄弱领域表现更为突出。

金融结构优化发展仍滞后于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当前,我国多元化、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仍然远远不足,融资体系的结构仍不完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直接融资比重仍然偏低。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我国社会融资中新增人民币贷款占比71.2%,而新增债券和新增股权融资占比仅为2.3%、4.5%。二是股票融资和私募、风投、三板市场融资发展缓慢。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新增股票融资规模占比下降至2.8%,远低于占比11.2%的新增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和占比96.3%的新增银行贷款融资规模。三是金融结构优化发展滞后,资本市场仍处于新兴加转轨的阶段,发展层次仍低,难以有效填补信贷资金收紧而释放出的市场空间,银行业对市场的垄断程度不减反增,与企业融资相关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相对滞后,尤其是与小微企业相关的信用环境、政务环境、政策环境建设不足,间接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政策重点

坚持差别化管理,引导银行积极服务小微企业。坚持差别化管理原则,明确“强监管、防风险”政策也应差别化管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业务要实施单独管理,给予差别化对待,可考虑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细化小微企业类型划分,调整细化相应监管考核指标,下沉普惠金融服务重心,实现真普惠;降低商业银行小微企业信贷资产风险权重系数至100%以下,并综合企业评级及债项评级设置不同的风险权重系数,节约商业银行资本;推进信贷资产转让以及债转股的市场化发展,盘活小微企业信贷资源,持续扩大试点银行

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无论改革开放事业如何发展,

意想干部的良好循环。坚决破除“洗碗效应”,做到真干假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让吃苦的吃苦、让有为者有位。真情关爱干部,帮助解决困难,关注身心健康,解除后顾之忧,让广大干部安心、安身、安业。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要求我们必须时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特别注重培养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把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作为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考察考察的重要方面、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管理监督的重要约束,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干部放到重大斗争一线去真枪真刀磨砺,使干部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保持共产党人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

突出为政底线，推动干部清正廉洁、清白做人、清心干事

忠诚干净担当是一个整体要求，忠字当头，担字为要，净字托底，也就是要求干部想干事、敢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党要赢得民心，干部要有威信，必须廉洁。我们要深化标本兼治，夯实治本基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发扬钉钉子精神，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靶向治疗、精确惩治，坚决减存量、重点遏增量，不断释放全面从严强烈信号。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和信托机构范围，增加合格私募投资机构参与市场交易。

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扩大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覆盖面和有效性。鼓励金融机构积极为小微企业提供供需匹配的个性化服务。强化小微企业信用信息管理,优化信用评价模型,科学设定授信审批条件,适当减少信贷审批对财务报表、可抵押资产等“硬”信息的倚重度,降低小微企业申贷门槛;推进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运用,构建针对小微企业的信息采集和分析系统,增强对小微企业个性化融资需求的分析,精准对接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提升对小微金融服务的产品设计和运营管理能力;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宣传工作,让小微企业充分了解可获得的不同金融服务,增强小微企业选择应用金融服务的能力。

推动金融结构优化发展,优化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可以考虑三方面措施:一是推进创投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和便利化。进一步扩大银行间市场双创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规模,适当降低双创债券发行门槛,调低净资产规模等财务指标要求,增加民营创投企业发债的可行性;将三大类“双创债券”纳入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合格抵押品范围内,引导商业银行、保险机构等机构投资者投资双创债券,提高双创债券市场流动性和市场需求,扩大创业投资企业的融资渠道和空间。二是推动以小微企业为服务主体的股权投资融资与交易市场建设。规范解决新三板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问题,增强二级市场的投资功能。增加区域股权市场一级市场交易的活跃度,促进挂牌企业实现实质交易。完善网络股权众筹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出台互联网股权众筹管理暂行办法,建立市场规则秩序,稳定市场预期。三是在省级层面,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统一的小微企业征信平台,依法采集、整理、加工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实现跨部门、跨行业的信用信息共享,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共产党人的本色都不能有任何改变,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血肉联系的高度统一性都不能有任何变化。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研究员)

题亮剑,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把惩治基层腐败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坚决查处涉黑“保护伞”,把全面从严治政覆盖到“最后一公里”。深化政治巡视,推进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

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建立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着力在日常监督、长期监督上探索创新、实现突破,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出问题。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其他监督相贯通的监察合力。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输送链条,推进公权力运行法治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力行使的任性空间,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健全及时发现问题的防范机制、精准纠正偏差的矫正机制,更多地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干部不断补钙壮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筑牢思想防线。大力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教育引导干部修身立德、提高觉悟,怀德自重、清廉自守,严格家教家风,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牢固树立正确用人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和社会氛围,移风易俗、成风化俗。加强经常性纪律教育,充分发挥先进典型引领示范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大规模减税降费的意义十分重要,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必然选择。

实际上,自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为了留住本国资本、吸引他国资本,各国降低名义税率的行动便成为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潮流。竞相减税的做法在一些地域相邻、体制相近的国家间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爱尔兰的低税率使周边国家不断降低税率。2003年,爱尔兰在将公司所得税税率从16%降至12.5%,此举也使其成为了全球公司所得税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作为爱尔兰的近邻,英国、德国和荷兰等国家饱受压力,多年来一直试图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其中,英国在2008年将公司所得税率从30%降至28%,在2011年降至26%,在2012年降至24%,在2013年降至23%,在2014年降至21%,在2015年降至20%,在2017年降至19%。德国在2004年将其公司所得税率由40.22%下调至38.9%,在2008年下调至30.18%。荷兰在2005年将其公司所得税率由34.5%改为31.5%,在2006年改为29.6%,在2007年改为25.5%,在2011年改为25%。再如,澳大利亚针对新西兰出台的减税举措颇具策略性。澳大利亚现行公司所得税税率为30%,而新西兰的税率为28%。为了提高税收的竞争力,澳大利亚展开了一项有针对性的减税行动。2017年3月31日,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立法,将“中小”公司所得税税率由此前的28.5%下调至27.5%,比新西兰公司所得税税率低0.5%,并将中小公司的年营业额门槛由200万欧元提高至1000万欧元。此次立法还规定,中小公司的年营业额门槛从2017年7月1日起提高至2500万欧元,从2018年7月1日起进一步提高到5000万欧元。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从中可见一斑。

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将大规模减税降费从战略层面落实到战术层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究竟如何在全球减税浪潮中制定中国方案,在国际税收竞争中赢得主动,就需要透视全球“减税潮”的全貌,消除认识层面的误区。实际上,全球“减税潮”有虚有实。

其一,“减税潮”的税率下降主要涉及所得税。回顾世界税收发展轨迹,可以清晰地发现其中的基本趋势:减税与增税并举,税负压力从直接税转移给了间接税。舆论场所提及的“减税潮”,主要表现在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等流动性税源上。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上找寻到确凿的证据。从整体看,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税率均明显下降,其中个税最高边际税率均值已从1980年的52.15%下降到了2017年的35.79%,而公司所得税均值则由48.03%下降到了2017年的24.18%。实际上,个人所得税减税与公司所得税的减税效果并不一致: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提高个人所得税标准扣除额,有利于吸引高科技能的人才,缓解纳税人的“痛感”;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有助于减轻纳税企业负担,增强纳税企业活力,吸引资本,增加投资。当然,所得税的减税趋势并非线性的,也曾出现过波折。国际金融危机后,面对财政困境和社会两极分化的压力,公司所得税率的下降态势曾一度止步,而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甚至还出现了向上的反弹。近年来,此前中断了的所得税减税进程又得以重启,国与国对流动性税源的争夺又重新开始。从个体看,各国均综合施策,减税与增税综合运用,税收政策相机抉择。一些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在这届降低了公司所得税税率,而在那届提高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

其二,“减税潮”并非税率全面下降,部分税种的税率不降反升。所得税率的下降仅仅是世界税收发展趋势这枚“硬币”的一个方面。在“硬币”的另一

虚虚实实的全球「减税潮」

□ 李 猛

方面,增值税日益普及,且税率普遍上升。究其缘由,与所得税比较起来,增值税有着天然的优势: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即为税负实际承担人,而增值税则不然,纳税义务人可以通过提高价格的方式将税收负担转嫁给最终消费者,因而其纳税时的“痛感”明显弱于所得税,并且,商品和服务一经售出,无论盈利与否或者盈利多少,相应的税金即可实现,便于政府的征收管理。有鉴于此,除了美国,迄今为止其他所有的经合组织成员国都陆续续开征了增值税。不仅如此,各国增值税的税率还进入了节节攀升的大通道。其中,经合组织成员国增值税平均税率已由1980年的16.08%上升到2017年的19.21%。如果把所得税层面的减税与增值税层面的增税结合起来,将会发现两者的节奏较为吻合。以日本为例,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在1989年由60%下降到了50%,同年,日本政府开征了增值税,并将税率设定为3%;1999年,日本政府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由50%进一步下调到了37%,并将公司所得税税率由46.4%下调到了40.9%,而在次年,其增值税税率便由3%上调到了5%;2015年,日本政府将公司所得税税率由37%下调到了32%,而将增值税税率由5%提升至8%。不难发现,所得税率与增值税税率之间呈现出了清晰的此消彼长态势。

面对全球“减税潮”,中国既不能无动于衷,又不能简单跟风。要在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税制体制改革、大规模减税降费,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现成的税改模式可以照搬照抄,一切需要从实际出发。当前,税制改革和减税降费的一个重点目标,是要弥合名义税负与实际税负之间的巨大鸿沟:一方面,要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行动各项工作,推进大幅度、实质性减税,尤其是显著降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维护诚信纳税人的权益,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新技术,增强税收征管能力,加大对偷税、逃税行为打击力度,维护宪法和税法权威。

